

POETRY EXPLORATION  
● 1999 · 1

# 诗探索



一九九九年第<sub>一</sub>辑 总第三十三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  
首都师范大学新诗研究室

主 办

中国亿豪集团有限公司协办  
画家石虎先生资助

# 诗 探 索

1999年第1辑(总第33辑)

主 编

谢 冕      杨匡汉      吴思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ZRB1/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探索:1999.1/谢冕等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

ISBN 7-5004-2443-4

I. 诗… II. 谢…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期刊  
IV. I207. 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9) 第 09771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首都师范大学语文报刊社承办 《诗探索》编辑部编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市朝阳区隆华印刷装订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50 千字 印数:1—3600 册

定价:7.50 元

# 目 录

诗歌与什么相关.....	谢有顺(1)
关于所谓“脱离人民”的理论基础.....	孙绍振(8)
秋后算账 .....	沈 奇(18)
——1998:中国诗坛备忘录	

## • 90 年代诗歌纵横谈 •

汉诗新世纪:诗人写作或“我”的写作.....	李 霞(31)
为何出现“萧条论” .....	王 珂(39)
——为 90 年代诗歌一辩	
90 年代的诗歌生态 .....	周晓风(51)
我观当代诗坛 .....	小 海(54)

## • 郑敏研究 •

试论郑敏诗思与诗学言路的共通性 .....	张姚洲(56)
郑敏诗世界的艺术评说 .....	朱红玲(78)
论郑敏早期诗歌中关于生命状态的思考 .....	蒋登科(90)
胡“涂”篇.....	郑 敏(100)

## • “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 •

字思维·旧诗·新诗.....	吕家乡(109)
形而上学的“字思维”及其讨论.....	段从学(129)

· 结识一位诗人 ·

- 飞翔的蝙蝠 ..... 张 柔(134)  
——翟永明论  
翟永明诗二首点评 ..... 钟 鸣(152)  
献给无限的少数人 ..... 翟永明(159)

· 姿态与尺度 ·

- 深层的乡土情结 深刻的生命体验 ..... 刘士杰(161)  
——评王耀东的乡土诗

· 嘉陵江诗话 ·

- 说说“个人化” ..... 沈泽宜(169)  
检讨我们的批评话语 ..... 赵 珍(170)  
文学史写作中的诗歌 ..... 孙基林(172)  
呼唤大意象诗 ..... 耿建华(173)  
隔膜墙与四“过于” ..... 雷业洪(174)  
与“杞人”谈诗 ..... 吴开晋(176)  
嘉陵江畔话新诗 ..... 金 栋(178)

· 外国诗论译丛 ·

- 我的航海日志(摘译) ..... [法]彼埃尔·勒韦尔迪著(180)  
树才译

# 诗歌与什么相关

谢有顺

荒诞派剧作家出身的现任捷克总统哈维尔，在他一度身陷囹圄时说过一句感人的话：“信仰生活，也许。”我相信这句话，是哈维尔经过许多苦难之后，所积攒下来的痛切而有力的言辞。生活这个平常的词，使哈维尔有了真实的记忆，为他以后一切的思索与写作，找到了展开的起点。他不虚构生活，对他而言，写作是为了更好地到达生活中那些让人惊讶的事物，而不是远离它。我们为什么害怕生活？我们的写作，为什么总是与虚构的经验相关，却永远不触及生活本身的边界？我想，这里面包含着很深的思想误区。只有那些软弱的人，才专注于“生活在别处”，而对身边蜂拥而来的真实措手不及。我的意思并非不要“在别处”的理想，信念，而是说，任何的理想和信念，都必须要能够有效地在他此时此地的生活中展开，否则，它就是假的。苏格拉底的信念，使他在面对毒酒时毫不惊慌，坦然赴死；哈维尔对生活的信仰，使他即便在狱中，也没有灰心，没有中断自己对世界的追问。事情就这么简单。

同样简单的还有诗歌或文学的困境问题，有关的议论浪费了公众太多的时间，事情毫无进展。那些对困境日夜忧心忡忡的人，设计了许多方案，可能惟独没有想到，困境只有一个：诗人和作家对他个人所面对的生活失去了敏感，对人的自身失去了想象。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中国的作家素来有好大喜功的传统，喜欢在作品中谈论惊人的命题，作出伟大的结论，里面却很可能找不到丝毫人性的气息。他们的体验方式是整体主义的，他们的作品基本上是社

会公论的结果，个人的、真实的、触手可及的，来自生活本身的希望或伤害却无限期地缺席。比如，我们经常能够读到许多直奔空境、虚无的作品，表达了作家对道、禅思想的心得，可很少有人告诉我们该怎样处理我们内心时刻都在涌动的欲望，即，在欲望与空无之间，该怎样转换和升华：我怎样才能从欲望的主体中脱身而出，抵达高不可攀的空境？我不相信省略了个人对欲望的真实搏斗的“空”和“无”是可信的。整体主义的致命之处就在于，他不是从个人真实的欲望出发，寻找途径抵达彼岸，相反的是，他往往从预设的“空”、“无”或其他什么彼岸理想出发，越过人作为欲望主体这一事实，轻易地就把人过渡到彼岸，完全无视人性。这样的整体主义作家不但违背了常识，也违背了他们自己的内心。他们写作时比谁都清楚，生活不是这样的。把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事物搪塞给读者，是文学贫困的内在秘密。其中，诗歌的问题尤为严重。年轻一代的诗人指责他们前辈的诗歌沦落成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他们自己却把诗歌改装成了一些不着边际的字词迷津，或者一种玄学气质，最终堕落成为知识和技术的奴才。我想起诗人于坚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我为什么不歌唱玫瑰”，他认为，玫瑰可以生长于英国诗人彭斯的诗歌中，却与他作为中国诗人于坚的存在无关，于坚说：“在我的日常话语中几乎不使用玫瑰一词，至少我从我母亲、我的外祖母们的方言里听不到玫瑰一词。玫瑰，据我的经验，只有在译文中才一再地被提及。”让一种与自己此时此地的存在无关，只涉及自己的知识背景和阅读经验的事物支配诗歌的写作，使当代的诗歌拥有了一个不真实的起点，它完全漠视此时此地他个人所面对的生活，这种对生活的麻木与不敏感，直接导致了诗歌的衰败。我们有理由认为，那些与诗人自己所面对的生活都无关的诗歌，也与我们的时代无关。

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让人感到困惑的呢？写作远离自己当下的境遇，凌空蹈虚，无所事事，那还有什么真正的诗歌可言？多数的诗人害怕生活，以为靠得太近的生活除了面目狰狞外，并无多少诗

意可言，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到故纸堆、历史古迹、远方的乡村、空旷的天空、发达的西方去寻找诗歌写作的资源，他们信奉的真理是：生活在别处，诗歌也在别处。这就是用整体主义、集体记忆、社会公论、“诗言志”来写作的恶果。这些人普遍喜欢谈论的人物是里尔克、卡夫卡、普鲁斯特、博尔赫斯等人，可他们无视里尔克的文化传统中固有的浪漫和神秘气质，里尔克的诗歌中常用的一个主词是“主啊”，这与他的信仰有关，但同样的呼喊在一个对圣经近乎无知的中国诗人口中说出，就显得矫情而危言耸听；他们无视卡夫卡作品中的恐惧、不安和绝望，正是来源于他敏感而压抑的生活：他的《在流放地》、《城堡》的灵感来源于他和费丽丝·鲍尔的婚约，《城堡》的写作冲动来源于和密伦娜·雅申斯卡之间的爱情失败后的痛苦经验，这是卡夫卡的生命中“最强烈、最深刻和最天翻地覆的经验”；他们无视普鲁斯特那个巨大的时间容器，恰恰是个人记忆（而非集体记忆）的回声，普鲁斯特在闭抑的法国书房里写下的充满白日梦的个人的生活细节；他们同样也无视博尔赫斯热衷于书籍与图书馆的迷宫，是因为他本人长时间来就是图书馆的馆长，置身于书籍的迷宫中，且他后来眼睛失明了。这些大师，写下了他们个人在自己的时代里的生活证词，他们的作品是人性的，非常人性的，而不仅仅像一些中国诗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些可以盗用、模仿的智慧和技术。

卡夫卡不是一个只关注形而上问题的作家，其实他的注意力一直都在他的自身，他的病，他的梦，他的焦虑，他最琐细的日常生活，他一切的追问和描述都是从这里开始的。1914年4月2日，卡夫卡的日记里只有两句话：“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这是非常奇特的，他把一个无关紧要的个人细节与重要的世界崩溃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有力地体现出卡夫卡的写作与生存不被集体记忆或社会公论所左右，他坚守的是个人面对世界的立场。克里玛在分析卡夫卡如何从完全是个人危机（出于捍卫个人写作的自由而对婚姻的恐惧）中进行写作时总结道：“当这个世界陷入战争狂

热或革命狂热的时候,当那些自称是作家的人受惑于这样的幻觉,认为历史比人更伟大、革命理想比人类更重要的时候,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而当另外一些人认为建立地上的人间天堂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卡夫卡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人可能失去他个人的最后凭借,失去和平和他自己一张安静的床。”“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这几乎是对卡夫卡的最高评价。在一个外在世界风起云涌的时代,很容易使诗人和作家的眼光转向大而无当的口号、理想、人类、未来、乌托邦等集体记忆的事物,而彻底遗忘个人内部的人性景象。卡夫卡不是这样,他用他人性的个人记忆,有效地区分了外部世界与他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不同,为他那个时代保存了一个真实的个体与世界之间的抗争史。但我们今天重读中国这几十年的新诗,在诸如“土地”、“青纱帐”、“祖国”、“天空”等意象中,亲见的多半都是集体记忆式的经验,很少知道来自个人的、人性的事物在过去的时代是怎样走过来的,又将怎样走过去。个人的缺席,人性生活的缺席,是诗歌内部真正的匮乏。诗人们过于注重和强调自己作为时代代言人的身份,而在写作中将更有活力的此时此地的个人经验省略了,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注意过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可能有的诸多细节,他整个就被自己的阅读和毫无想象力的社会公论所误导了。这样的诗人写出的不会是他个人的诗歌,记述的也不会是他个人的想象力,他不过是完成社会和群众交给他的写诗任务而已。

诗歌到底与什么相关?我想起哲学家蒂利希的一个回答,他说,艺术所要呈现的是“无论如何与我相关”的事物,诗歌也如是。这其实是诗人对自己与对世界的一种词语上的承担。有了对“我”的处境的敏感,有了对此时此地的生活的痛切感受,并知道了什么事物“无论如何与我相关”,真实的写作才有可能开始。美或者痛苦,往往都是存在于生活的隙缝中,没有敏感的心灵或很强的诗性警觉,是无法发现它们的。所以,任何伟大的诗歌,都不会仅仅是一些空洞的抒情和意象,它一定包含着诗人对此时此地的生活细节

的警觉。他们的诗歌可以证明他们曾经很实在地生活过，并且心灵上曾经与那些生活细节有着亲密的关系。从这个意义说，普鲁斯特、博尔赫斯、卡夫卡、福克纳等人都是诗人，他们的作品是真正有诗歌光芒的少数篇章之一，而且，阅读他们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他们对自己笔下的生活是多么熟悉！相比之下，面对已经沸腾的生活，许多的中国诗人更像是一个腐朽的无病呻吟者。他们在书房里，在经典上，注释、收集着精彩的句子，以期在词语上建筑更精致的宫殿，惟独选择在生活中缺席。他们以为自己承担着语言操作的使命，其实承担的不过是他们腐朽而平庸的趣味。博尔赫斯曾在一篇文章中，讽刺那些文体迷信者，想通过精雕细琢使自己的诗成为“一首没有虚言废话的诗”，“可它却是满篇的废话，总之，是一堆残渣废料。”这可以从众多充满神话原型、文化符码的诗篇，以及海子死后涌现的成堆模仿其风格的诗作中大量看到。海子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幻想力和直奔终极的激烈气质，使他成了80年代那种思想环境的代表人物，但他也属于过早就想接上人类的巨型话语而省略了生活这一中介的诗人之一，他的幻想，是以抽空此时此地的生活细节为代价的，他后来的追随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而把海子糟蹋得体无完肤。由此也可以看出，要在充满集体无意识的中国文化中贯彻个人的、当下的立场是多么的艰难。

个人什么时候出场，真实的人性生活、“无论如何与我相关”的事物什么时候能得到表达，这是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问题。诗人只有带着个人的记忆、心灵、敏感和梦想进入此时此地的生活，并学习面对它，也许才能发现真正的诗性——一种来自生活深处、结结实实、充满人性气息的诗性。当个人面对世界的苦难和伤害，并承担词语的责任时，才有真实的诗歌可言。我想起威塞尔的随笔中讲到的俄国伟大的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在斯大林时代，曾日复一日来到并站到卢布扬监狱门前的长队里，带着一个给他儿子的包裹。数以百计的妇女们在那里等着轮到她们。每个人都有亲人在里面：丈夫，兄弟，儿子，父亲……一天早晨，一位老妇转头对她说

道：“你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吗？”“是的。”“你是否认为有一天你能够讲述这个故事？”阿赫玛托娃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是的，我会试试的。”威塞尔接着写道：“老妇人激动地望着她，仿佛在掂量着这个回答；接着一道微笑第一次出现在她疲惫的、毫无血色的脸上。”我喜欢这个充满俄罗斯精神的场面，阿赫玛托娃带着一颗诗人的  
心灵面对苦难，与那个极权的年代，个人，监狱中的儿子，诗歌，这些都成了真实的生活细节，阿赫玛托娃实实在在地置身其中，我相信，这是她写下伟大诗歌的重要资源，但是，她在那个老妇人面前，却对词语上的承担（“讲述这个故事”）保持着审慎的态度（“我会试试的”），她不愿轻易许诺记述整个时代，当她站在监狱门前时，也许惟一让她有信心的就是如卡夫卡那样“描绘和捍卫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阿赫玛托娃做到了，对她而言，最个人的就是最真实的，也是最人类和时代的。以个人的名义，主动承担时代所给予他（她）的每一个生活细节和其中的责任，是诗人真正的使命之一。诗歌要想恢复读者的信任，首先要恢复的就是与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真实的“我”的人性关系，也只有从细节和人性中生长出来的美，才是有活力的诗性的美。

我们已经厌倦高言大志，厌倦精雕细琢，厌倦没有人性气息而又天马行空的所谓想象力，厌倦那些有词语癖的诗人所批发出来的没有任何心灵真实的词语，正是它们，把诗歌推向了绝境。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来到最个人和内部的领域，重新恢复对真实、美、朴素、细节、此时此地的生活、有责任感的心灵等事物的挚爱，什么时候使诗歌“无论如何与我相关”，希望就将在其中生长出来。诗歌，最高的艺术之一，应该在这个沸腾的时代，重获心灵的力量，当下的力量，“描绘和捍卫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从而使其能够有效地在我们的精神生活领域展开。我想起在希特勒的集中营，有一个叫玛莎的小孩写过这样一首短诗：

这些天里我一定要节省。/我没有钱可节省；/我一定要  
节省健康和力量，/足够支持我很长时间。/我一定要节省我

的神经和我的思想和我的心灵/和我的精神的火。/我一定要节省流下的泪水。/我需要它们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一定要节省忍耐,在这些风暴肆虐的日子。/在我的生命里我有那么多需要的:/情感的温暖和一颗善良的心。/这些东西我都缺少。/这些我一定要节省。/这一切,上帝的礼物,我希望保存。/我将多么悲伤倘若我很快就失去了它们。

还有一个叫莫泰利的小男孩,也写过一首类似的短诗:

从明天开始,我将悲伤。/从明天开始。/今天我将快乐。/悲伤有什么用?/告诉我吧。/就因为开始吹起了这些邪恶的风?/我为什么要为明天悲痛,在今天?/明天也许还这么好,/这么阳光明媚。/明天太阳也许会再一次为我们照耀。/我们再也不用悲伤。/从明天开始。不是今天。不是。/今天我将愉快。/而每一天,/无论它多么痛苦,/我都会说:从明天开始。/我将悲伤,/不是今天。

我在多年前读过这两首小诗,至今无法忘怀。它们是人类历史上最感人而有力的诗篇之一。它们的作者不过是孩子,他们不懂什么叫技巧,什么叫文化经验,甚至他们懂得的词汇都非常有限,可他们有的是对苦难生活的敏感,对“我”的关切,还有真实的心灵细节,他们是真正像诗人一样歌唱的人。让每个人都来读这样的诗作,都来感受这样的心灵。这些“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这些最朴素的词语承担,唤起的是我们真正读诗才有的悲伤和羞愧。在玛莎和莫泰利这两个孩子面前,那些凌空蹈虚的诗人要低下他们高傲的头颅。

(责任编辑 林莽)

# 关于所谓“脱离人民”的理论基础

——根据在张家港诗会上的发言重写

孙绍振

## (一)

来到张家港，十分感奋，这是因为：看到了一些硕果仅存的老诗人。在我年轻的时候，最初的诗歌气质、趣味就是受到他们作品薰陶的。这不但使我回忆起他们当年的诗歌，而且使我想起了我少年时代的心境，当我知道坐在我面前的诗人就是屠岸的时候，我问他，是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写过诗，他说，没有啊。我说，可是我念过你的诗，那是对共和国为数不多的颂歌中的一首。当时中学语文教师作为补充教材发了下来，并没有讲解，可是我却记住了。开头的句子是这样的：

你长途奔波的历史老人啊，应该停下脚步，赞叹又欢呼

.....

他笑了起来，说：是的，有这样一首诗，发表在当时上海的《文汇报》上。可惜，已经忘记了，没有收集到自己的选集里去。后来我又遇到绿原先生，我告诉他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是在解放前出版的《开明少年》上；那好像是叶圣陶或者夏丏尊先生主编的。那里有一个栏目，叫做《诗人的心》，刊物是解放前出版的，但是，我却在1954年前后，在昆山中学的图书馆里把它找了出来。

那一期介绍绿原的一首诗，是悼念弟弟的。第一句是：

小河转着弯回家了，

绿原先生笑了起来，他说是有这么一首诗。但是，他却不知道《开明少年》给转载了，而且还有人写了评介的文字。我问他事情是不是真的。他说，不是，是虚构的，就是写一种儿童失去弟弟的感觉。我记得，他的一本集子和艾青、亦门、鲁藜、天蓝、田间、冀藜、孙甸的诗集编在胡风先生的《七月诗丛》里，叫做《童话》。在1952年，我进入高中的时候，恰巧书店卖特价书，我就买了一套，虽然其中有好多诗，我不一定全懂，但是，就我所记得起来的诗句来看，绿原先生的诗的确充满了孩子气的童真。

往日已经淡化了的记忆被唤醒以后，肯定会变得更加不可磨灭，成为来日亲切的心灵财富。

但是，在振奋的同时，我又感到一点忧虑。

主要是，这次来参加会议的，所持观点是相近的。从大会发言来看，都是对后新潮诗人的探索表示非议的。我自己也对这些年轻诗人的创作倾向表示过不满。为此我还在前年的《星星》和去年《诗刊》第一期上对他们进行了可以说是相当、甚至空前严厉的批评，用了“败家子”、“犬儒主义”、“挟洋自重”、“艺术教条主义”等等的语言。

当我发出这样的批评的时候，我是严肃的，我在那两篇文章中详细地叙述了我十多年反思的过程。但是，我并不以为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我的看法就是真理，就没有偏颇。我到这里来并不完全是为了听到相同的意见，更为强烈的愿望，是听到年轻人，尤其是被我批评的人，对我的反批评。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没有争鸣，就没有学术。没有不同意见，就没有开学术讨论会的必要。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到了这里，我听到的大都是没有必要的雷同。

这次全国性诗会的主题是团结、繁荣。但是，如果在会上只听到一样的意见，没有多少异议，把不同的意见排斥在会外，这能不能叫做真正的团结呢？在会外是百花齐放，在会上是一家作主，这样的现象至少不能说是正常的。再说，繁荣，光有同样追求的诗人们努力，一种风格，或者同类风格，是不是能够真正繁荣起来，这是

一个很值得沉思的问题。

这还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令人更为忧虑的是，不少朋友在对后新潮诗人提出批评的时候所持的基本观念，其大前提，并不是很可靠的。就哲学基础来说，甚至可以说是抱残守缺的。不少发言者批评当前的新诗“脱离人民”。他们的意思我是体会到了的，但是，作为一种严肃的理论却是粗陋的。既脱离了中国新诗批评的历史经验，又脱离了当代学术思想的最新成就。

不少发言者非常严厉地批评当代青年诗人，却又缺乏他们所具备的哲学和文化学理的基础，对于他们的话语和范畴十分隔膜。给人一种印象，人们并不以自己修养方面的不足而遗憾，相反倒以自己封闭性而自豪。

早在 1980 年的南宁诗会上，我就告诫过那些反对朦胧诗而又很有雄心壮志要引导青年的朋友：既然你声称看不懂，那你又凭什么去引导人家呢。难道凭你干饭比人家吃得更多吗。难道看不懂是你们的光荣吗？我的意思是要引导就得钻进去，像鲁迅和创造社论争那样，进入他们的学理境界；同时还要进行自我解剖，自我更新。

如果满足于从感性上表示不满，甚至强烈地义愤，除了说明我们无能以外，只能表明我们懒惰。

对自己不懂的东西懒得去钻研，这是我们的通病，这也包括我自己；这不仅是指老一辈的朋友，而且也包括年轻的朋友，他们对老一辈的话语，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同样是懒得理睬的。但是，在这里，在这个会上，我感到占优势的是，我们对于他们缺乏沟通的哲学基础和谦虚的愿望。我们没有争取到足以与他们创作和理论水平相当的代表来参加，就是一个明证。

本来，我们这个诗坛早就分化了，互相批评几乎成为聋子的对话。这常常使我想起：一群长得过分矮小的，已经停止发育的人和一群长得不合比例地细长的，还在继续地窜长的人在互相指责。而

长得过分细长的一群对于来自过分短小的人指责不屑一顾，而停止发育的一群则并不因此情绪受到打击。

## (二)

在这里，来自许多方面的对于年轻的探索者的批判集中在一点上：他们“脱离人民”、“脱离现实”、“脱离群众”。这种批评的诗学基础出自诗歌应该“抒人民之情”的经典信条。

但是正是他们对这种经典信条的执著，更使我感到忧虑。

这给我一种时光倒退的感觉，这本是在朦胧诗辩论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然而历史的前进往往比之思想的前进更快速得多；思想落后于现实，理论落后于创作，也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真正理论家的任务却不该是在历史性理论争论已经澄清了以后，又振振有词地把它重新搅混。

我建议：批评年轻的探索者脱离人民的朋友们，扪心自问：这种所谓抒人民之情的理论本身是不是就有一段长期脱离人民的历史？一系列当年被奉为抒人民之情的佳作，现在看来，是真诚地抒了人民之情，还是虚伪地表现了反人民之情？

1998年底，我在应《文学报》为纪念朦胧诗20周年而作的文章《历史的选择》中回顾了朦胧诗出现之时遭到的非难，也是集中在脱离人民，脱离群众这一点上：当年的所谓抒人民之情经典理论，在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检验，有没有留下什么惨痛的教训呢？我在那篇文章中这样总结：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抒人民之情，而是人民这个概念被异化了。人民与诗人的自我被绝对地分裂了，人民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与活生生的老百姓现实生活人为地割裂了：

所谓抒人民之情是与某种流行的政策、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的。符合某种政治需求的，就叫抒发了人民大众的情感；不符合的，就是脱离人民大众的情感。在这种理论统治下，多少诗人，不敢相信自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睛，相反反倒要

相信空洞、甚至虚假的概念。诗人的成功之道不是无限地贴近自我，而是远离自我。把抒人民之情和忠实地自我表现绝对地对立起来，这就是长期以来，诗坛上充斥着假大空诗、口号诗、吹牛诗的原因。虚假成为当代中国新诗的一大顽症。多少虚假的诗歌仅仅由于符合了一时流行的意识形态，政治运动的要求，就被赞扬为表现了人民群众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短命的政治运动为实践所证伪了以后，那些被当作经典加以鼓吹的作品，就暴露了它不但是麻醉了人民而且麻醉了自我，麻醉了艺术。如果要历数这些诗坛垃圾的作者的话可以把许多泰斗的名字，而且可以把我自己年轻时期的一些作品都包括进去。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反复地重演悲剧，却没有引起马克思所说的喜剧性的感觉。这种顽固的虚假毁灭、糟蹋了多少诗人才华的理论，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并没有立即受到正面的清算。所幸，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年轻一代的诗人们提出了冲破感觉的硬茧，重新感觉真实的自我的美学命题。（《文学报》，1998年12月3日）

当年的朦胧诗大辩论，在重重压力下，在理论上曾经对此作出过英勇的冲击，但是真正学理上的基本建设并没有来得及进行。起初是由于外界的压力，处于被整肃的地位；后来是由于过分浮躁地为新引进的西方文化哲学所吸引。再加上，朦胧诗在创作上所取得的风靡一时胜利掩盖了理论上的不足。理论积累的贫弱就导致了至今许多拥护、欣赏朦胧诗的朋友在表述他们对另一种诗歌潮流的不满时，所使用的以“人民”为话语中心的理论恰恰是当年反对朦胧诗的理论核心。

看来，历史的批判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随着学术的发展，新的时代不能不在新的理论制高点上对旧的理论问题作出新的解释。不这样就可能产生两个结果：第一，不断作低水平重复，如同在五六十年代的大陆诗坛在批评胡风、右派时期一样；一种就是历史的倒退，如同在40年代的解放区和浩劫期间一样。